

毛泽东 和他的 「右派朋友」

薛建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薛建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620/56

A712
11

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

MAOZEDONGHE TADE YOU PAI PENG YOU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

薛建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蒲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10 千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932-7/A·11 印数：1—20000

定价：6.80元

DG20/26

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

薛建华 著

引言

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一个人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怎么行呢？我的朋友就有周谷城、张治中……”

周谷城、张治中等人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未被打成过“右派分子”。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称他们为自己的“右派朋友”，并要中共领导人都要有这样的朋友呢？原来，毛泽东是用“右派朋友”一词涵盖一切非中共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交往，是这位伟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可是，过去这却是鲜为人知的一面。

作为中国革命的非凡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一生充满了自信。即使面对斯大林，他也是不卑不亢、气宇轩昂。但他却会在中南海上恭敬地为一位国民党老将军亲自划船。

毛泽东的眼泪是“吝啬”得出名的。他身边的人一生中也没有见他哭过几回。抗美援朝时，他心爱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他也没有哭过。然而，他在相隔18年后见到周谷

城时，眼泪却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是赞美历代君王有所作为的“套话”。但是，有谁见过像毛泽东这样，当女作家丁玲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红军中，他竟用军用电报把赞美诗拍发到前线的丁玲手中。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中国革命的道路异常艰辛，毛泽东在斗争的每一关头，都表现了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和坚持真理的“毫不留情”。可是，他与民主人士无论发生天大的争论，甚至相互恶言相加，但他从不把这上纲上线为所谓“路线斗争”。他多次明示左右：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他自认为的最大嗜好，就是两三好友、“天马行空”式的“聊天”。解放战争决战关头，他使自己脑子“轻松、轻松”的办法，就是让警卫员去叫上诗人肖三一同散步，两人闲聊少年时光的趣闻逸事。建国后，周谷城常常半夜乘上毛泽东的专机，应召到毛泽东的住地和他“聊天”。

毛泽东把与各界知名人士的交往，看成是使身心极度放松的时刻。因此，在这种完全忘我的时刻，这位一代伟人的天才智慧和精深思想，往往会无拘无束、轻松自然地释放出来，显得如此得心应手，潇洒自如。

从这个特殊意义上说，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交往，更能真实地反映毛泽东的“自我”，或者说是对他生活的其它侧面的补充和印证。

此外，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履历，也向史学界、理论研究

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毛泽东何以喜欢交这些“右派朋友”。

1972年，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

“我喜欢右派。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他认为：至少，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

所以，毛泽东几乎花了毕生一半以上的精力，与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交朋友，并同他们礼尚往来，相濡以沫，历时之久，影响直至今日。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相当重要的一面。

撩开历史的面纱，展现时代的底蕴，探寻震撼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生命履痕，我们看到了毛泽东更加丰满，更加完整，也许还可以说是更加真实的形象。

目 录

- “他可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呀！”
——毛泽东与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 (1)
- “我就是要看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
——毛泽东与思想家梁漱溟 (48)
-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毛泽东与女作家丁玲 (84)
- “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 (107)
- “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毛泽东与“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123)
- “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了”
——毛泽东与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 (150)
-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毛泽东与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 (177)
- “共产党不过河拆桥，我也不过河拆桥”
——毛泽东与程潜将军的同乡情 (192)

- “肖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毛泽东与“鲁迅的弟子”肖军 (218)
- “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毛泽东与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 (239)
- “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
——毛泽东和诗人肖三 (274)
- “看来，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
——毛泽东与国民党将军郑洞国 (299)
-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周谷城 (312)

“他可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呀”

——毛泽东与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

张治中比毛泽东长几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也比毛泽东早出名几年。

他在1945年结识毛泽东前，甚至怀疑毛泽东何以能成为中共的领袖。然而，一接触，两人便一见如故。重庆谈判，毛泽东只身入虎穴。张治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他希望国共和谈成功。毛泽东为张治中和平谈判的诚意所打动。而张治中则从心底暗自浮现出对共产党人的敬佩和喜欢。1949年，张治中再次成为国民党和谈的首席代表。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用“上好的酒菜”款待了他，并逢人就介绍：“他可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呵”。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在北平，他心下惴惴不安。毛泽东说，过去的事就算过了大年三十，咱们再从初一做起。

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均邀张治中参与意见，包括国旗图案，包括人大开幕词。毛泽东与张治中私交也不错。巡视南方，他也邀请张治中同行。他与张治中之间无话不说。发生争论时，毛泽东说：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在毛泽

东的人际交往史中，还是少见的。“文革”期间，红卫兵来抄家，张治中出来制止。红卫兵问：“你是什么人？”张治中说：“我是谁，你们去问毛泽东。”这话把一批造反派都“镇”住了。与毛泽东在一起，张治中也无话不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受到举国疯狂崇拜的毛泽东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意思是对“文革”过火行动提出委婉的批评。毛泽东对此没有说任何话。张治中可能是他在“文革”中唯一容忍的批评者。

张治中病重时，毛泽东派人送去东北最好的人参。

他和他，真正是患难之交、好朋友。

从他们交往的经历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留给人们一个颇耐回味的话题。

同是典型农家子弟。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

张治中论毛泽东：“1945年以前，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在国民党那么多起义将领中，毛泽东独把张治中引以为“友”，这并非是两人过去相交甚早，也并非张治中与毛泽东神交多深，恰恰相反，用张治中本人的话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与毛泽东并不是同乡。张是1890年出生，比毛泽东还大三岁。两人只有一点相同：这就是同是典型农家子弟出身。

张家是巢县西乡一个叫做洪家疃的村子里的大户。但到了张治中祖父辈时，张家已败落成为以务农为业的普通农家。祖父张邦栋俨然一典型的农村老者，刚直性格，常说直道话。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很少离开村子。这一点，与毛泽东的祖父、父亲极似。

张治中靠个人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军旅之途。1924年北伐前夕，他已在蒋介石手下升任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1925年东征胜利后，又调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副官长。

这时候，毛泽东也同在广州。不过，他并未与张治中有过晤面，因为他当时正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风急浪涌的大革命时期，两位政治家同处一地而又失之交臂，诚是一大可惜。这以后，两人相识并进而相交，却是20年后的事了。

“和平将军”。蒋介石曾怀疑他“必通共匪”，释疑后又委以重任，在毛泽东的家乡任省主席。徐特立说“张治中是坦白的。”

从大革命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虽已分为两个阵营，但20年间，共产党人对张治中的了解却从未中断过。

首先，中共对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美誉表示肯定。张

治中由于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内的地位不断攀升。但是，他却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的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的将军。

抗日战争时，张治中将军毅然请缨，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两次率军与日寇在上海血战。第一次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第二次是1936年“八一三淞沪之役”。在上海人民和全国各界的声援和支持下，创造了著名的上海保卫战的胜利，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可惜，后来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不得不放弃了上海。当蒋介石要张治中率军去与红军对垒时，张立即交出了军权，表示宁愿去军校当教官。

对此，蒋介石等人曾很是怀疑，认为张治中同情红军，“必通共匪”。但是，在戴笠等人的庞大情报网全力搜索后，却没有这方面的一丝半点线索，蒋介石只好作罢。后来蒋介石见张治中身居要职，却从不揽权谋私、拉帮结派，才逐渐放下心来，并相继委任张治中以要职，如湖南省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等，直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了解，也许还有另外一面。上海淞沪保卫战后，张治中转任湖南省主席。而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他自然十分关心那里的一切政务。

湖南还是中共的发源地之一，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何键等的反共政策下，这里的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击迫害特别严重。

使中共对之极为愤慨。

张治中到任后，开诚布公，与各界坦诚相处，力求一切事都有公平合理的解决。任内一年又两个月期间，居然使当地各派势力相当融洽相安无事。

一次，毛泽东故乡旁的浏阳县逮捕了一位中共干部，该县县长竟捏造刑事罪犯的罪名，将这位干部枪决。张治中知道这事后马上派人查明事实，给予那个县长撤职严办的惩处。

张治中把办案过程一一通报了中共湖南组织。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后，湖南籍的老革命家徐特立还提起这件小事，对张治中大加赞许。徐特立说：“张治中是坦白的。”这是指当时张治中对中共人士的通报与中共中央后来对案情调查后的实情是一致的。

虽然没有在此期间留下毛泽东对此的评语，但相信他从自己十分尊敬的“徐特老”前辈处，已经了解到许多情况。毛泽东是在以后的重庆谈判时才与张治中相识并一见如故的，但，“和平将军”，湖南执政，这些不能不说是已奠定下相当的基础。

重庆谈判的伏笔。日本人投降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一到延安，初识毛泽东。张治中对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与美国特使赫尔利用专机将毛泽东接到重庆。

毛泽东知道和理解张治中，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而张治中提及毛泽东，则比此早了三年。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可是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两党关系又开始破裂。两党商谈虽未断，但久无成果。

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此刻，他忧心如焚，多方劝慰，力主合作。也许是他的诚心所至，竟使蒋介石酝酿起亲晤毛泽东的念头。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急约张治中到其官邸。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后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忙答道：“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当即，蒋就亲笔写了封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治中。这时，专程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将军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就在家里为他饯行，并于当晚把信交他带回。

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事情来得太突兀，中共方面对蒋的邀请未有任何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向仍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这一有点“惊人”的初衷，就这样无声息地消亡了。但是，论者认为，这却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由延安到重庆伏下重要一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各阶层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建立和平的环境，重建家园。民主党派和大后方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谈话，呼吁国共双方采取克制态度，在中国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国际上，苏美英也不赞同中国内战。更重

要的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发动内战所需兵力的调遣、战略的部署尚须时日。于是，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采纳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于8月14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邀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电文说，“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

紧接着，蒋介石于8月20日、23日又连发二电，措辞更为恳切，“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和美国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这样，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谈判，把战争责任加在中共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则妄图诱逼中共交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即使谈判不成，也可借机部署内战。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学系都曾企图以请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里去做官，来诱使共产党交出武装，用软的一套手法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均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报纸和民主人士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文章和评论，有的称“蒋主席这几句话，言简意诚”、“蔼然诚坦，溢于言表”；有的致电毛泽东要看中共方面的态度；有的则公开宣布，恳请毛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还

有的舆论认为，毛先生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毛先生不出来，就是先生的不是了。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审慎研究，一方面虽然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反共方针未变，提出谈判只是欺骗舆论的缓兵之计，内战危机仍十分严重，对此绝不能放松警惕；另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在当时的形势下，争取和平、民主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中共有责任尽最大努力争取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即使把内战推迟一些，也十分必要和有益。最后，中共中央经过郑重考虑，慨然电复应约。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

8月27日，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这是张治中初到延安，也是他初次见面。

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可以说，两位政治家此后漫长的诚挚相交于此即已开始。

翌日，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等人即从延安飞返重庆。双方在九龙坡机场合影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希望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共同奋斗。重庆以及国内各报对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会晤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今后将“国运开拓，前途无